



一以贯之坚持走自己的路

□ 武力

编者的话:方向决定前途,道路决定命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艰辛探索。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要有志不改、道不变的坚定,一以贯之坚持走自己的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1978年以前的探索与实践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华民族以新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统一财经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新中国奠定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基础。但是,中国生产力水平落后、人均资源匮乏的贫穷落后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如何解决“吃饭”问题,突破“贫困陷阱”,实现经济发展的“赶超”,以保证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复兴,在民主革命和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以后,就摆在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新中国成立之初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些农户在正常年景下,温饱问题尚不能解决。另外,工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不到20%,而且是以轻工业为主。工业不仅自我积累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且不能够适应国家安全的需要。根据当时的情况和需要,我们党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经济极端落后和非常有限的财力,与即将开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建设所需要的資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缺口,而当时新中国又必须加快工业化步伐。在严峻形势下,西方国家政治与经济上的孤立和封锁,决定了新中国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实行迅速而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来启动工业化进程,而有限和分散的农业剩余几乎是获取这种积累的唯一途径。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速工业化,中国就需要建立起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以确保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配置能力。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步伐的加快,都是加快工业化的产物。

应该指出,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的探索中,以“自力更生”和高积累为手段,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超常规发展,虽然导致了各个方面的紧张和工农关系的失调,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但是也的确取得巨大成就:第一,在短时期内建立起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第二,在某些方面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起强大的国防工业,拥有了“两弹一星”;第三,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工改造和投资,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尤其以农田改造、水利建设、重工业发展最为突出,保证了20世纪80年代农业的高速增长和城乡轻工业的快速发展;第四,通过强制性地推广低成本、覆盖全社会的初等教育和医疗保障,提高了人力资本。

此外,这个时期社会主义所具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体现出来,如:通过“大会战”的方式实现了石油工业的飞速发展;通过“集体攻关”的方式加速了科技创新;通过“三线建设”缩小了沿海与内地工业发展的差距;等等。但就总体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改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呈现出成本上升和效益递减的特征,越来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与时俱进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逐渐认识到,以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

划经济体制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也不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4月,他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迅速改善人民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发现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差距正在拉大的巨大压力,成为中国共产党在1978年以后突破传统束缚、推动改革开放的最大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充分汲取过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突破前30年形成的发展模式,实现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带有根本性的突破和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同时,国际环境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成效和国内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为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一,根据战后30多年来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要主题,改变了我们过去对外部环境的认识,从而使得中国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打开国门搞建设。

其二,国际环境的缓和与保障国家安全能力的具备,也为改变国内长期实行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高积累政策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农、轻、重关系,并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普遍提

高职工工资来扩大消费。

其三,与上述协调发展和提高人民消费水平目标相匹配,进行“放权让利”的体制改革,允许地方政府、企业和人民群众“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这种改革自然也就从过去束缚最多的农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广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经济的微观机制,也为城市改革提供了榜样和示范。于是,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引导下,加上“放权让利”的制度和政策保障,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上下结合的强大改革动力,突破了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的束缚,从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经济基础。

其四,从“放权让利”和农村改革一开始,就自然出现了市场调节,长期受到抑制的市场因素迅速复活,并日益显示出其调节经济的灵活性、及时性和有效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及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市场机制调节的范围和配置资源的作用越来越大。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78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接近10%,经济总量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跃升至第2位。这不仅开创了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时代,也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在人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社会并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视提高人民收入、改善分配结构,使经济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总之,经过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与时俱进并且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其经济体制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的积极作用,可以有机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获得共赢;而且还体现在其所具有的强大经济发展动力和充分利用各种资源的能力上。

三、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

在政治建设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放在突出位置,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统一思想、坚定信心、抓住机遇,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下决心解决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中存在的障碍和弊端,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外延型、粗放型发展方式必须转变。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工业化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后,那种赶超型的后发优势、劳动力转移和资源配置优化的“红利”开始消失,而有效需求不足、产业升级所导致的传

统产能过剩和“资本沉没”,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转入中速或低速。我国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开始进入调整期。另外,从世界经济来看,从2008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深度调整期,而已经高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也必然要受到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与这种新的发展形势和要求相适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而且,这些年来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使对外开放更加扩大和深入。总之,中国正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激发澎湃动力,克服资源环境压力加大、产业结构升级阵痛、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等困难,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在消除贫困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了重大突破,并制定了时间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不仅充分体现了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也显示出党中央迎难而上、敢于啃硬骨头的决心。从目前脱贫攻坚战的进展来看,中国是可以在2020年实现脱贫目标的。

总之,新中国70年的艰辛探索和成功实践,不仅使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且向世界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使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发展的康庄大道,必须毫不动摇走下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

本版编辑 赵登华

学习笔谈

追求绿色发展繁荣 做强做大绿色经济

□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牺牲“绿水青山”来换取“金山银山”。恩格斯曾经指出,“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我们必须尊重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不是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竭泽而渔,决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发展。

第二,发展方式绿色化。生态环境的问题在本质上与经济发展方式相关。由于自然环境的自我调节和再生修复功能相对较弱,只有彻底改变以往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已经被恶化的生态环境才有可能逐渐得到改善。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使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必然要求和根本路径。为了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化转型,我们既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大幅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水、土地等消耗强度,同时,还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

第三,产业结构绿色化。马克思认为: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力。一方面,自然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对象,也是经济生产的资源,阳光、河流、地热等自然力量直接参与经济生产过程本身,成为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自然力是生产者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和先决条件,自然界以衣、食、住、行等形式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维持和发展着生产者的体力与智力,而生产者的脑力和体力发展又是一切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因此,自然环境蕴含经济价值,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经济财富。产业

结构绿色化重构,就是要改造升级高耗能、高污染、效益低的传统产业,支持发展科技含量高、节能环保的新兴产业。这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长期矛盾的必然选择。

第四,增长动力绿色化。一般来说,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三

个方面:一是行动力,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个主体,特别是企业和社会组织实现绿色转型和绿色发展的创新能力;二是拉动力,指通过经济利益、精神嘉奖等多种手段对绿色经济发展行为给予正向激励和引导;三是推动力,指依靠经济系统以外的强制性力量,如法律、规章制度等,对可能损害环境的经济发展行为给予严格的约束和制衡。其中,绿色创新能力是最主要的力量,如果市场经济主体自身行动力缺失或不足,无论外界的推动力和拉动力如何加大也是难以真正发挥作用的。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绿色化转换是必然的路径选择。

第五,效益评价绿色化。长期以来,我国对经济发展效益的评价是基于单纯的经济数量指标,如国内生产总值(GDP)等,这是造成经济增长的同时背负严重的“生态赤字”的一个重要原因。毋庸置疑,GDP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经济发展的效益,但却不能反映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高消耗、高能耗、高污染等环境问题。因此,经济效益评价亟需绿色化转型,我们不能以GDP论英雄,而应遵循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相统一原则,对经济发展规划、经济政策、经济建设项目等进行包含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在内的综合性效益评价。同时,还要将绿色指标纳入干部考核评价和任用制度,引导各级政府推动绿色经济发展。

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我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只有有经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产业结构、增长动力、效益评价绿色化,才能做强做大绿色经济,让绿色成为发展最亮的底色,从而推动我国实现绿色发展繁荣。(执笔:杜玉华 段艳丰)

理论驿站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作出重要部署,强调“必须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核心是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性选择和必然要求。我们应从多方入手,提高认识、确保落实。

(一)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是为了推进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不是说不要发展,因为离开经济发展抓生态保护是“缘木求鱼”,难以持续;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发展,因为脱离生态保护搞经济发展是“竭泽而渔”,贻害无穷。所以说,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并不是降低对发展的要求,更不是不要发展,而是要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绿色、低碳和循环的道路推动更高水平的发展。当“保护”与“发展”两者发生冲突时,决不能以破坏生态、损害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必须深入理解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辩证关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绘好“山水图”,念好“草木经”,打好生态牌,走好绿色路。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是为了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享有更优美的环境。为此,一方面,要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来抓,使老百姓拥有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另一方面,要加快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步伐,以持续改善的生态环境来促进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的优化,助推旅游业、金融业、生物产业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让广大人民群众更直接感受到保护绿水青山就是保护金山银山,在拥有蓝天碧水的同时,分享到“绿色福利”,决不能让老百姓守着“金饭碗”富不起来,也决不能走以损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的老路。

(二)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护好生态环境,必须坚持辩证法、两点论,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用好,形成市场作用

把生态保护优先落到实处

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具体而言,就是一方面要注重完善环境监管,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制度,着力解决群众感受最直观、反映最强烈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注重运用经济手段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与建设,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采取多种方式支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过经济杠杆的运用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和民间资本投资生态保护项目,使其在参与生态保护和建设中获益。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要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着眼于整体,从全局出发,统筹规划,平衡各方关系,实现整体目标的最优化。这就要求对生态环境保护进行顶层设计,用全局观对生态文明建设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规划。同时,由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复杂性,矛盾和问题往往盘根错节,必须找准突破口,所以发挥基层首创精神也很重要。还有,由于各地方基层之间存在客观差异,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也需要鼓励支持地方、基层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从而成为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的有益补充。所以,保护好生态环境,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及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基层的积极性,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把自上而下的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力量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强大合力。

坚持生态保护优先,要用制度机制来保障。建设生态文明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方面面,需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来守护绿水青山、保障绿色发展。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选择。必须进一步强化制度保障和法律约束,确保生态保护始终摆在优先位置。要用制度强化各级党委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责,做好生态环境干部配备工作,充分满足生态保护建设的要素配置,保障生态环保建设资金投入,大力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战,并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要建立完善生态保护优先负面清单,进一步提高违法违规成本,加大执法力度,对造成严重后果的人依法追究责任,真正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此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重在行动。要在充分发挥制度建设治本作用的同时,积极培育生态文化,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

(执笔:王东)

□ 青海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